

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构中的通俗文学

DOI:10.16532/j.cnki.1002-9583.2015.04.013

孙 丹

狭义的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精神文明的总和,主要包含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世俗文化三个层面。精神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也是主流文化的主体,它代表着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and 价值观,主导着民众的思想意识和精神世界。制度文化是不同的社会中文建设的制度安排。世俗文化则是文化系统中最为庞杂、也最为活跃的部分,它体现着基层民众的精神生活状况,反映着动态的文化景观,折射着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一个民族文化生态的晴雨表。

通俗文学是世俗文化的一部分,是指具有亚文化性、主要表达非主流的大众心理和社会意识、由个体文人以商品生产为主要动机创作、以现代书刊为传播媒介、艺术表现具有幻想性和类型化特征、以消遣娱乐为主要功能、包含浓厚的传统文化心理和时尚文化元素的一种文学样式。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通俗文学因其亚文化性,在传统社会中,常常被视为反文化而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斥和挤压。在新中国文化发展史中,通俗文学的兴衰,鲜明地体现了不同时期主流文化理念的微妙变化。新时期通俗文学的复兴,与流行音乐、娱乐性的影视剧^[1]等一道,为当代中国文化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实践路径和理论思考,也启蒙和催生了中国新兴的文化产业。

一、通俗文学在文化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当代命运

在文化发展史上,文学艺术之被区分为雅俗,并有高低贵贱之别,实则是主流文化视阈中的分野,这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表现。比如,古希腊美学家认为,在戏剧中,悲剧是美的、是正确的,因为“悲剧所写的是王侯,是严肃的行动……而喜剧所写的则是私人的事,是笑谑”。^[2]在当今通俗小说大国英国和美国,20世纪以前,通俗小说也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图书馆拒不收藏通俗小说家的手稿和作品,批评家和学者对通俗小说从不研究并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认为阅读这类小说“浪费时间,腐蚀才智”,是“一种罪孽,愚蠢而且有害,等于吸烟和文字游戏之类的东西”。1950年代前后,在文化研究的热潮中,兴起了对通俗文化的研究,一些大学开设了通俗文化的课程,开始研究通俗小说。1990年代版的《美国文学史》和《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中始现对通俗小说的研究。^[3]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雅俗之别也是由来已久。在主流文化意识中,雅与俗代表着对立的价值判断,存有高下之分,谓高雅、低俗,雅正而俗邪。连文学体裁也有高下之别,诗词歌赋是雅言,其他体

裁都是等而下之的。“雅”可以经国济世,“诗言志”,“文以载道”。而“俗”是底层社会的文化,通俗作品的创作者也多是欲登“庙堂”而不入的下层失意落魄文人。在统治者眼中,平民百姓所喜好的俗曲时调、通俗小说只为娱人耳目,不仅于世道无补,还会乱心坏性。故此,唐宋以后,通俗小说时时受到歧视和打击。明清时代,市民阶层出现并壮大,世俗文化获得空前的发展,统治者对通俗小说的禁毁也日趋严厉,许多描写世俗爱情的通俗小说被作为“淫词小说”查禁,如明代的《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清代的《红楼梦》《西厢记》,以及《今古奇观》《拍案惊奇》等经常出现在禁书书目中。^[4]然而,追求娱乐消遣功能和经济利益的通俗文学,虽屡遭禁毁,仍与时俱增,不仅娱乐时代众生,也成为后人了解不同时代社会生活丰富的文化矿藏。

20世纪初,中国文学传统发生了巨变,小说地位空前提高,成为新文化、新文学的主体。“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5]但此“小说”非彼“小说”。“五四新文学,实际上是文学总体上的一次通俗运动……文学语言解放了……提倡的是现实主义,内容是启蒙主义。所有封建迷信、神秘怪诞、才子佳人、武侠剑客,都在排斥之列。”^[6]可见,新文化中的小说,并非传统意义上“引车卖浆者流”的通俗小说,而是吸收了“外来的新兴的潮流”,^[7]能够取代传统诗骚地位、并仍须承载巨大历史使命的新小说。虽然在世俗文化较为发达的都市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通俗文学盛极一时,大量通俗文学报刊和出版社行世,^[8]但是新文学一直进行着与通俗文学的论辩和斗争。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都批判过鸳鸯蝴蝶派作品“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9]和“提倡新政权,保守旧道德”^[10]的封建保守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文化领域迅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新文化在建设过程中,对具有浓厚封建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旧小说(通俗小说)、旧戏曲、旧出版业等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了清理、改造和整合。鸳鸯蝴蝶派小说、武侠小说以及传统戏曲等具有较强消遣娱乐功能的“文化遗产”,由于其间混杂着大量有悖新文化的因素,而受到了持续的批判和清理。此外,在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文化艺术生产和活动也逐步纳入了计划的轨道,有关部门对各种公、私营媒体的纸张供应、出版发行数量都作出了严格规定,以及私营出版业的萎缩,客观上抑制了具有商品经济特征的通俗文学报刊的生存。与此同时,在完成全民阶级成分的划分后,中国社会基本没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层级之分,包括通俗小说作家在内的自由职业者,与城市和农村的各种社会成员一道被陆续组织到各种行政和非行政的单位、街道、村社中,各种宣传、文化网络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在此基础上,各种有组织的群众文化活动和群众运动取代了各种民间自主的文化娱乐活动,通俗文学的读者也逐渐星散,活跃于民间的通俗文学报刊陆续停办,通俗文学的创作者因为载体的不复存在,也纷纷改弦更张。通俗文学基本上被当作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而遭到摒弃,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具有鲜明主文化特征的、吸收了传统通俗文学表现手法的革命文艺^[11]成为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计划文化体制下的革命文艺不再具有商品的属性,其文化功能中的娱乐功能越来越被淡化,教化的功能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新时期伊始,理论界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一些通俗文学作品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建国后17年间创作的一些优秀文艺作品成为“重放的鲜花”,呈现在新一代读者面前。而这些作品,如《红岩》《平原游击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新儿女英雄传》《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等小说,无不继承了中国传统通俗文学的表现手法,具有极强的传奇性和娱乐性,不仅在当时风靡全国,成为红色经典,即使在今天,也仍然能吸引新一代读者。但是,对1980年代潮涌的通俗文学,理论界的第一反应不是粗暴批评,就是持漠视态度。这使得通俗文学以一种另类的、不合法的身份回归到新时期的文化生活之中。

二、通俗文学对 当代中国文化版图的影响

尽管通俗文学在建国以后逐渐淡出了社会文化生活,但作为承载着深厚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化基因,它对新中国文化版图的影响一直或隐或显

地存在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革命文学对通俗文学美学特征和文化功能进行了选择性继承。

通俗文学的美学特征和文化功能主要表现为作品内容的传奇性、故事情节的完整性、艺术形式的模式化以及时尚性和消遣娱乐性。这种审美特性突出体现了普通民众安贫乐道、追求生活安定圆满的文化心理,以及通俗文学和世俗文化的消遣和娱乐的功能。而新中国文化的重要目标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强调建设性。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文化一文艺的教化功能。在继承传统通俗文学审美特性的时候,更多地考虑将其作为实现新文化教化功能的一种手段。

新中国的新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不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新文化主要是延安时期文化模式在全国范围的实践,其指导思想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培养的文化干部在建国后成为文化战线的主要力量。新中国培养的一些作家,包括延安时期的作家,特别是工农作家,既不同于饱读诗书的传统文人,也与接受现代西式教育的新文人的文化教养背景大不相同。这些作家虽然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但他们来自底层,谙熟传统通俗文化,他们的精神文化素养主要来自传统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

新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决定了它所描写的主体和所服务的对象,都是识字不多或者是刚刚扫盲甚至是文盲的广大基层民众,这与传统的通俗文学受众是高度契合的。对大众读者特别是低文化层次读者审美趣味的重视、对传统文化心理的表现,以及创作手法上注重民族形式,是革命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契合点。新作家的出身、背景也使他们对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审美心理有着十分透彻的理解。因此,革命文学作家继承传统通俗文学通俗晓畅、浅显易懂、口语化的语言,选取富有民族特色、为工农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造出一种既适应工农大众需要的富有民族色彩的表现形式,又赋予作品充满革命理想、激越奋发、昂扬向上的新的审美情趣,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与中国平民文化的完美结合。建国后十余年间,产生了一批反映党领导人民争取解放和翻身,

歌颂觉悟了的人民在抗日战争、民主革命中的主体意识和精神风貌的优秀文学作品。最受欢迎的正是与传统完美结合的作品,这些作品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革命英雄传奇,其中既有以新小说体写的传奇故事,也有的是直接用章回体、评书体创作的,主人公历尽艰险,而终得圆满的结局,如《烈火金刚》《新儿女英雄传》等。2、因地域特征而形成的创作群体,如山药蛋派小说、白洋淀派小说等,其特点也是继承了传统文化中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而广受欢迎。3、“反特”和惊险小说。这类小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小说的传奇特征,而且借鉴了西洋侦探小说中的推理描写和惊险情节,在革命文学中最具惊险刺激效果、最具阅读快感、最具娱乐性,因而也是最受欢迎的作品。

(二) 新时期通俗文学的复苏,瓦解了“雅高”、“俗低”的传统观念,雅俗文化从对峙走向共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新时期以来,在传统观念和新中国文化发展现实的双重作用下,主流文学和通俗文学在文化观念和美学观念上的对立冲突突然变得尖锐起来。而沉寂多时的通俗文学一旦找到出口,也立刻显现出亚文化泥沙俱下的特点。这使通俗文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都遭到了普遍质疑,也为文学、文化观念的变革增添了不少障碍。

对通俗文学的质疑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文学是否具有娱乐功能、通俗文学是否具有审美价值;二是文学作品作为精神产品是否可以成为商品牟利。可以说,“娱乐文化”和“商品文化”既在理论层面、也在实践层面成为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负面的关键词。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文化经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期,港台流行文化吸引了无数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目光。而此时,各级文化事业单位主办的各种文艺期刊由于经费不足,开始纷纷进行以刊登通俗文学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化尝试。由于文化事业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本来就是广大基层民众,这种尝试获得了读者的极大认同,迅速取得了经济效益。

就在“雅”与“俗”、“高”与“低”的理论之争尚无结论的时候,全国各地文化事业单位如文联、文化系统,纷纷创办通俗性的、综艺性的报纸、期刊,不少党报、党刊也开办通俗性的副刊,开设

通俗性、纪实性小说连载的栏目。大多数省份都有几种或在全国或在省内有影响的、发行量几万到几十万份的通俗文艺杂志。至于地方性的以通俗小说为主要内容的小刊物就更多了。以群众文化系统为例,全国各省市群众艺术馆、文化馆都创办了以刊登娱乐性通俗文艺作品为主、以赢利为目的的文艺刊物,或者将原有的刊物改版为通俗文艺期刊。1980年代中期,是通俗文艺媒体的大发展时期。1985年,仅湖北省就有四家期发20—30万字、期发行量超过几十万份的大型通俗文学期刊。^[12]当时,仅广西一省,通俗文艺报刊就达53种,“每种小报发行量约在100—200万份之间”。^[13]更为意味深长的是,高雅文学在越来越失去轰动效应和广大读者、一部分作家沉醉于文体实验时,追求平民化、向故事性回归的新写实小说却已悄然结出硕果了。同时,一方面通俗文学的火暴成为一个参照,迫使高雅文学开始关心读者的趣味和市场的反映;另一方面,一些专业作家干脆直接加入了通俗文学创作大军,在实践上结束了雅、俗的截然对立,也为文化多样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通俗文学期刊脱离文化事业进行产业化经营的实践,则将文化经济观念潜移默化地植入中国文化中,成为撬动文化观念转变杠杆。

1990年代,雅俗之间的深壑趋于平缓。20世纪末出版的高等学校文学史教材中,设置了单独的章节讲述通俗文学。^[14]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由苏州大学教授编撰的近140万字的巨著《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也于2000年面世。^[15]雅俗文学由对峙走向了共生,共同面对市场的挑战。

(三)通俗文学热潮之后,大众文化风生水起。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台,确立了娱乐性、商业性的流行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合法地位。

活跃于20世纪中国的通俗文学是前工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初期,以阅读为主要文化生活方式的产物。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通俗文化已经是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文化娱乐方式也超越了阅读领域,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文化艺术生产领域,电子出版系统的发明使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数字技术在音乐、影视等艺术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文化政策与时俱进,在物质条件和文化环境方面已经积聚

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条件。1990年代以后,文化理论界开始对中国文化发展模式进行理性思考,总结经验教训,文化体制改革加快了步伐,具有鲜明工业化生产特征的元素——大众文化及其文化产业呼之欲出。

文化产业被称为无烟工业,具有无污染、低能耗、高附加值的特点。发达国家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过程中,对文化产业均采取扶持的政策。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电影、音乐、畅销书就已传遍世界。^[16]到七八十年代以后,世界发达国家更是把文化产业提高到比传统产业更重要的地位,通过文化产业推动经济增长,其产值已超过传统产业。一些强势国家利用雄厚的资金和庞大的文化产业,向全世界倾销其文化产品,不但取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强化民族文化意识,输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新世纪以来,文化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大众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产业发展问题引起了决策者极大的关注,上升到文化安全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高度。2001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发展和建设问题首次被列入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此后,党和政府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各种政策陆续出台,文化产业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三、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思考

文化建设的方向和内容是由所处社会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恢复重建经济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重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新文化。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成为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两翼。这一建设过程经历了艰难曲折,也是尚未完结的工程。总结新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对新世纪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文化分层理论与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文化定位。

从古今中外文化发展历史中不难看出,对文化性质的认定和文化功能的理解,是决定文化生态的关键因素。把通俗文学、大众文化放在文化学和社会学的透视图上,就可以获得更准确、适当的理解。

在社会学意义上,文化有主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三种形态。主文化表现为一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德伦理、政治规范、审美情趣、宗教信仰的总和。反文化则是指与主文化对立的异质文化。反文化破坏、腐蚀和消解主流文化的社会价值准则,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紧张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政党对这一类文化产品都是坚决禁止、打击和取缔的。

而广义的亚文化概念,是指生长和流传于民间大众的文化形态,既有地理区域性特征,如古巴楚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今京派文化、海派文化、特区文化等;也表现为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特征,如民间文化、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文化、校园文化、宗教文化等。一般来说,亚文化作为主文化的补充而存在,与主文化相伴相生,与反文化若即若离,既含有与主文化相对应吻合的部分,也有与主文化相游离、容易转化为反文化的因素。正因为亚文化具有良莠难分、精华与糟粕共生并存的特点,便常常被视为反文化。

通俗文学作为世俗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明显的亚文化性。虽然世俗文化受制于主文化,在积淀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中烙印着正统意识,但也常常表现出不同于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和社会意识,与主文化保持着一种对抗性的张力,貌似反文化,如通俗文学最为发达的样式——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中这一特点就十分鲜明。而在政权更替、社会变革时期,如建国初期,这一特征的传统性和落后性尤显突出,因此,往往遭到主文化的忽视甚至唾弃。而通俗文学在当代中国的沉浮兴衰,正是在政治诉求中建立纯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理念之下,经济体制变化、文化观念、文化定位的曲折经历的反映。而执政者在历史发展和文化建设中,对文化复杂性和文化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促进了文化观念的转变。

(二)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与文化产业。

文化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特殊的生产力。文化生产力不仅具有经济学的一切属性,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因此,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中,都必须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发展初期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文化方向的担忧,以及目前阶段视文化产业为纯粹经济体的想法都是失之偏颇的。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仍然是解决文化经济发展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艺术生产”的理论伴随着唯物史观从创立到成熟的过程。在唯物史观形成初期,马克思就指出了文学艺术活动与物质生产的内在联系,即文学活动本身就是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的产物。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劳动创造了美”,人以其生产实践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以及自由性区别于动物。因此,马克思在考察文学活动时,是把人的本质、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及其产品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的,从而产生了关于艺术生产的重要思想“宗教、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态,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7]

这就是说,艺术生产既具有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定性,是对象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统一,同时,因为艺术生产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态”,又体现精神生产的特殊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了社会分工在精神生产发展史上的重要影响,明确地把一般社会生产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提出了“精神生产”概念“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同人们的物质活动,同人们的物质交往,同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18]

可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文学—文化生产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实践活动,是特殊的经济活动,文化产品是特殊的商品,附加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价值。文化产业既是经济活动,也是包含政治和伦理因素的社会活动,文化艺术生产理应受到一般生产规律和艺术生产特殊规律的双重制

约。如果我们只看到一般生产规律,无视艺术生产规律,必然会缺失人文精神和历史理性,将精神产品沦为文化垃圾。反之,如果无视一般生产规律,把艺术生产都变成少数人把玩的精神奢侈品,则背离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也不利于文化的发展繁荣。在未来的文化建设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把理论正确地运用于实际当中,才能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是保持文化生态平衡的基础。在世界民族文化大家庭中如此,单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也是如此。从文化功能的角度来看,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即使相同的人群或个体,不同的时间、地点、心态也会有不同的文化需求。与自然界因保持丰富多样性而达到生态的平衡一样,保持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才能获得文化生态的平衡与发展。□

[1]通俗文学主要是指通俗小说。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在文本阅读盛行的时代,通俗文学曾经与流行音乐、娱乐影视片三分天下。

[2]瓜里尼《悲喜剧混杂体诗的纲领》(1601年),《世界文学》1961年第8期。

[3]参见黄祿善、刘培骥主编《英美通俗小说概述》,上海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清代查禁的小说中,有些确为淫秽小说,如《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痴婆子传》《株林野史》等。

[5]梁启超《新民说》,载《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

[6]孙犁《谈通俗文学——芸斋琐谈》,《人民日报》1985年1月4日。

[7]鲁迅《关于〈小说世界〉》,《鲁迅全集》第7卷第3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8]据不完全统计,1900—1949年建国前,在南方以上海为中心,北方以北平、天津为中心,先后创办174种通俗报刊。《小说月报》在茅盾接办前也是通俗小说杂志。参见范伯

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语出自沈雁冰(茅盾)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

[10]“提倡新政治,保守旧道德”语出自民国通俗小说作家包天笑《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91页,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

[11]革命文学(小说)是革命文艺的体裁之一,电影、戏剧、音乐等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另,本文中红色文学、革命文学、高雅文学均指代表主流意识的文学作品。

[12]即《今古传奇》《中国故事》《中华传奇》《千古风流》。《千古风流》于1990年代中期停刊。湖北省文联主办的《今古传奇》在1985年时曾有单期发行270多万册的记录。上海群众艺术馆主办的小型期刊《故事会》期发行量曾达到700多万册。而纯文学期刊发行数量则急剧萎缩,一些久负盛名的文学期刊发行量由几万份、几十万份萎缩到几千份。

[14]《广西“通俗文学”热调查记》,《文学报》1985年第2期。

[1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此前,1990年代以后,有张赣生的《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上海通俗文学研究所编、陈必祥主编的《通俗文学概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春桂、刘炳泽著的《中国通俗小说概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王先需、於可训主编的《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等著作出版;1992年7月到1998年12月,曾有《通俗文学评论》双月刊在湖北武汉出版。

[17]据上海影剧业工会发行分会西片联合委员会不完全统计,1945—1949年间,美国八大影片公司从上海输入中国的影片达1896部;据京津电影院业和过去一部分西片工作者统计,1947年美国在北京、天津、沈阳等七个城市中头轮影院票房就达260多万美元。见《人民日报》1950年12月8日。

[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0、30—31页。

(作者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